

解读《蒙古袭来绘词》

桥本雄（北海道大学）

概要

日本镰仓后期“蒙古袭来”（蒙古入侵日本）这一历史事件的相关史料极为少见，其中《蒙古袭来绘词》（宫内厅收藏）生动描绘了两场战役成为珍贵的史料。《蒙古袭来绘词》是肥后国（今天的熊本县）下级武士竹崎季长让人绘制的，竹崎季长本人也亲自参加了两场战役。该绘卷作为蒙古入侵的基本史料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这部作品现今的状态其实是在江户时代宽政年间（19世纪初期）经过后期修复形成的，而且绘卷中有很多前后次序的混乱和改动，可以推测宽政年间修复时有很多增笔。这部作品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例如，它有两个“奥书”（卷末所附的创作旨趣），而一般作品都只有一个“奥书”；所用纸张也并不统一。

因此，如果要从史学角度来研究这部作品，首先要对其进行细致周到的史料批判。该作品虽然是绘画作品，但描绘的并非实景，所以绝不能从作品现今的状态简单地去读取历史事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运用这部作品、发挥其价值，就必须进行细致周到的史料批判。本论文在近年来有关蒙古入侵以及该绘卷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考察绘卷的生成及绘制者的意图、企图，对绘卷原有状态进行想象性复原。

通过本文的考察，希望能够从泛亚洲史角度获取蒙古入侵表象论的一个切入点。

简历

1972年生于日本东京。199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2000年，东京大学博士课程满期退学，2004年获得博士（文学）学位。

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九州国立博物馆成立准备室、学艺部研究员，现为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中世时期的国家交流史和文化史。主要专著有：《中世日本国际关系》（吉川弘文馆，2005年），《伪装的外交使节》（历史文化丛书，吉川弘文馆，2012年），

《“日本国王”与勘合贸易 足利将军家为何要向中国皇帝“朝贡”？》（追溯日本史：外交篇（7）室町时代，NHK出版，2013年）等。

概要

日本历史学界对蒙古帝国的认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杉山正明通过发表系列著作及借助媒体的力量，彻底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形象，其学说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中。另一方面，一般国民对蒙古袭来事件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战前这一事件曾被用来加强国民同一性，从那时到今天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本文拟对西洋画家矢田一啸（1859-1913）的全景图《蒙古袭来绘图》与最新日本漫画中的相关描绘进行对比。这些关于蒙古军队的画像或影像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都描绘了先进的火药武器，但其中有的火药那个时代是否真的存在，其实并未得到近年来系列专门研究的证明。尽管如此，这些画像、影像却将其描绘成蒙古军实际使用过的武器。

蒙古在征服中亚花刺子模王国沙王朝并向巴格达进攻的过程中，攻陷了诸多城市的坚固城墙，在这个过程中也引进了各种武器。在远征中国南方时，创建了水军。在征服中国及花刺子模的过程中，蒙古帝国学习并吸收了当地的各种技术（引进技术工匠），自然也包括军事技术。关于蒙古军队是如何使用火药武器的，至今还有很多未解开的谜团，本文将从文献学及考古学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思考现今我们可以做怎样的判断。

简历

1974年11月21日生于福冈县北九州市。现居京都。1993年3月毕业于福冈县立京都高中。1998年3月毕业于大阪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业）。2001年3月毕业于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文化形态论专业）博士前期课程。2003年~2005年，留学于北京大学历史系。2007年3月，毕业于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文化形态论专业）博士后期课程。2007~2012年，担任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特聘研究员。曾担任过帝塚山大学（2007~2013年）、关西大学（2010~2013年）、甲南大学（2011~2013年）等校的兼职讲师。2013年4月至今，任同志社大学全球地域文化学部副教授。

主要著作：

「第二章 蒙古：海洋力量的结构与变迁 The Structure and Transition of Mongol Sea Power」『世界历史与帝国 (Global History and Empire)』, 秋田茂 Akita Shigeru, 桃木至朗 Momoki Shiro 編 eds., 大阪大学出版会 (Osaka University Press), April-2013, pp.71-106.

「元代“朝貢”与南海信息 (The Tribute Trade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Information about Nanhai Countries at Yuan Court)」『元史論叢 (Yuanshi Luncong)』10 (中国元史研究会 Zhongguo Yuanshi Yanjiuhui), July-2005, pp.389-406.

“The Interests of the Rulers, Agents and Merchants behind the Southward Expansion of the Yuan Dynasty,” 『吐魯番學研究—第三屆吐魯番學暨歐亞游牧民族的起源與遷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Journal of the Turfan Studies: Essays on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urfan Studies The Origins and Migrations of Eurasian Nomadic Peoples)』(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May-2010, pp.428-445.

“‘Muslim Diaspora’ in Yuan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slamic Tombstones from the Southeast Coast,” *Asian Review of World Histories*, Vol. 4(2), July-2016, pp.231-256.

(http://www.thearwh.org/journal/ARWH_4_2_Articles/arwh_4_2_Mukai.pdf)

作为蒙古影响力一环的“蒙古的袭来”

四日市康博（昭和女子大学）

摘要

13世纪到14世纪，蒙古帝国及其继承政权席卷欧亚大陆，其支配与影响遍及各个地区和社会。在欧亚大陆出现超越语言、宗教、民族等文化性框架的蒙古式共通形式。以经济、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蒙古霸权下安定的东西往来被称作“蒙古和平”即 Pax Mongolica。但是该概念只是片面看法，无法说明经济、文化交流的全部内容，也并不意味蒙古霸权下欧亚大陆迎来了没有战争的和平状态。蒙古与欧亚各地的文化圈和社会之间，时而冲突、时而相克、时而共存、时而融合，两者的交流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的特点。在欧亚各地，有所谓“蒙古冲击” Mongol Impact。只有认识到各地域和社会对此各有对策，才能理解交流的内容及随后的影响。因此“蒙古袭来”，不仅指短期的政治军事冲击，也包括长期经济、文化影响。所以“蒙古和平”与“蒙古冲击”是共存且互为表里的概念。理解欧亚整体的“蒙古和平”，需要先了解欧亚各地的“蒙古冲击”的态度以及对策。日本曾两度遭受蒙古侵略，也是最早开始研究“蒙古袭来”的国家。但是，先行研究都着眼于日本与元朝两国间关系，或者与高丽的三国间的外交、军事关系。蒙古帝国即元朝的对外侵略并不仅限于日本，而是包括越南、占城、缅甸、爪哇、琉球、库页岛等海域在内的亚洲全境，相互间并非毫无关联。而且在亚洲各地，“蒙古冲击”的影响其后也长期性持续。

作者简介

1996年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业。2004年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学分修满退学。2007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2005/4-2008/3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专任讲师（付任期）。2009年~驹泽大学文学部非常勤讲师。2012年~早稻田大学综合研究机构中央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所招聘研究员。2014年~昭和女子大学国际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研究领域为蒙古帝国时期的东西欧亚交流史，海域亚洲交流史。

主要著作：《从器物看海域亚洲史——蒙古到宋元时代的亚洲与日本的交流》（福岡：九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

原著：日本語、译者：宋剛

元朝诸帝春猎秋猕与昔宝赤、贵赤执役考论

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

元朝诸帝沿袭蒙古国旧俗，在大都郊外柳林一带春季“飞放”，在上都附近的东、西凉亭及三不刺等地“秋猕”。后者分为纵鹰捕禽和围猎捕兽，大规模的合围捕兽仅见于世祖、成宗和英宗三朝。负责养鹰“飞放”的汉地昔宝赤鹰房定籍，始于窝阔台时期。兴和路和察罕脑儿是上都附近御位下昔宝赤鹰房户主要聚屯地。管领诸路打捕鹰房总管府、仁虞院和仁虞都总管府等则为朝廷统辖昔宝赤鹰房的机构。“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和“昔宝赤右手万户”，分别以辽阳行省境内、黄河中下游筮起和驻戍的鹰房户作为兵员基础。元中叶昔宝赤及所属鹰人逐渐形成“爱马”（部），文宗朝急剧扩张到 14024 人，构成皇帝怯薛内部最庞大的分支集团。《马可波罗游记》、伯希和注释及《元史·明安传》等交互印证：贵赤以“脚力便捷与快行”为其专长，具体职司大抵是徒步携犬参与皇帝行猎。许有壬“人虽狗监知文士，世是鹰房袭小儿”诗句，恰似为昔宝赤和贵赤等“鹰背狗”协同执役做点睛般的评鹭。围猎原本就有草原民骑射的军事演习动员的寓意，大多数蒙古人把飞放行猎视作最大的乐趣和荣耀。与两都岁时巡幸相匹配的春猎秋猕，是元朝统治者恪守蒙古本位或接受汉文化多寡的“寒暑表”。武宗海山修建中都及柳林附近的“呼鹰台”，又欲将“春猎秋猕”行宫升格，构成“三都一台”，以“重温”蒙古国大汗四季行宫习俗的“旧梦”。

略歷

1949 年生于山西太原

1978 年 10 月——1982 年 7 月，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本科生；

1982 年 9 月——1985 年 7 月，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6 年 9 月——1988 年 12 月，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1985 年 7 月——1990 年 12 月，南开大学历史系讲师

1990 年 12 月——1993 年 12 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993 年 12 月——今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997 年 7 月——2000 年 10 月，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

2000 年 10 月——2006 年 12 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2011 年——今 南开大学讲席教授

朝鲜王朝所修高丽史书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内容提要

从元至元十年（1273）到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派大军前往征讨日本，尽管最终都失败了，却是近世东亚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两次征讨过程中，高丽军队都是元东征军重要的援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等史书，对元东征历史都进行了记载，其对这件历史的评价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视角。本文试图从历史书写的视角，探讨朝鲜王朝官方对于这件历史的认识，并对影响历史书写背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深层根源，略作探讨。

简历

1966年生，男，湖南衡东人。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获得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8）、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1）。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赴韩国高丽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香港城市大学和台湾大学为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韩国史、中韩关系史、中国史学史和明清史。

已出版专著《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译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魏斐德等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世鉴：中国传统史学》（伍安祖、王晴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在海外内刊物发表中外文论文百余篇。

“深簷胡帽”考：一种女真帽式在蒙元及此后时代的盛衰史

张佳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概要：

明朝洪武元年发布的更易“胡服”诏令，曾经专门提到元代流行的“深簷胡帽”。综合考察蒙元时代的各类资料可知，这种具有深刻时代特征的帽式，即是“幔笠”（或名“方笠”、“四角笠子”）。幔笠本是金代女真服饰，后被蒙古人接受，并在蒙古征服的裹挟下遍及中国、高丽、中亚乃至波斯地区；使用人群亦遍及君主、臣僚、文人、庶民各个社会阶层。元明鼎革之后，它被汉族士大夫视作中国在元代“胡化”的重要象征，从而迅速淡出历史舞台；丽鲜易代之际，幔笠也在朝鲜半岛上演了类似的历史。

幔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迄今为止的蒙元服饰研究，却对其缺乏正确认识，以致与明代帽式混同。有关幔笠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许多重要图像资料的时代，而且幔笠在东亚流行与消亡，也从侧面见证了烜赫一时的“蒙古风”的兴衰、以及东亚儒家知识分子“胡汉华夷”意识消涨的历史。

简历

1981年生，山东高密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学士（2004）、清华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学硕士（2007）、复旦大学历史系专门史博士（2011），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社会文化史，出版有研究专著《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发表论文《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再叙彝伦：洪武时期的婚丧礼俗改革》、《别华夷与正名分：明初的日常杂礼规范》、《衣冠与认同：丽末鲜初朝鲜半岛袭用“大明衣冠”历程初探》、《明初的汉族元遗民》等十余篇。

摘要

蒙古帝国的出现与扩张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蒙古曾经入侵高丽，深刻地影响着高丽。我们将蒙古影响高丽的时期大致分为战争发生时的“抗蒙”时期以及战争结束后“干涉期”。第二次进行的“东征日本”则发生在第二个时期。蒙古希望高丽能够降伏日本，要求诏谕日本，结果诏谕不成，之后蒙古军同高丽军一同讨伐日本，开疆拓土。

过去，学术界倾向于认为“东征日本”是一场由蒙古主导，高丽参与的战争。但是事实上当时的高丽国王（元宗与忠烈王）在第一次远征后，曾怀抱消极回避的态度，但之后又积极地加入作战，态度曾发生转变。本文中，我们不谈“东征日本”事件，而是着重探讨引起忠烈王态度转变的原因，分析忠烈王改变立场的意图以及政治目的。

近来，学术界不断有人讨论 13 世纪中后期忠烈王的政治立场。最近研究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于高丽立场的改变。换句话说就是不再强调高丽倚靠蒙古而发起的这场战争，而是着眼于当时在蒙古深刻影响下的高丽以及高丽的国王是如何运用当时的时局，影响高丽-蒙古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忠烈王的地位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他是高丽的国王，又是高丽蒙古王室联姻第一人，之后又成为蒙古最高地方长官——“征东行省”的丞相。但是做蒙古的驸马，是高丽率先提出的联姻；征东行省虽是由蒙古设立行政机关，但忠烈王也在行省内部拥有自己的权力。换言之，高丽的国王，也就是忠烈王，他凭借着蒙古的力量确立自己的王权，扩大自己的权力，通过成为驸马，丞相，以期达到自己政治上的目的。

1170 年之后的 100 年间，武臣政权，高丽的王权被不断地削弱。1270 年武臣政权垮台，王权重新执掌朝政，但是鉴于当时与蒙古之间的关系，高丽改变了诸多现有的机制。忠烈王与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联姻，形成了高丽与蒙古之间的王室联姻，并且依照蒙古的要求，将以中书门下省等 6 个部门为中心的官制，降格为由僉议府和其他 4 个部门组成的体制。另外像达鲁花赤这样蒙古的官员，军队也在高丽常驻。这种变化成为保证高丽王权稳定，扩张的决定性因素。蒙古曾派遣使臣赵良弼劝降日本，外交接触失败之后，立即准备发动战争。使臣的派遣以及第二次东征日本都得到了高丽的支持。蒙古第一次远征日本，高丽曾在 1274 年派遣 30500 人，建船 900 艘，士兵 6000 名，水夫 6700 名。而在 1281 年第二次远征时，则派出战舰 900 艘，战士 10000 名，水夫 17000 名。所以这样庞大的人力物力支援给高丽带来沉重的负担，高丽内部产生严重的混乱，也曾多次申诉。

如果我们从在政治层面上分析忠烈王，可以看出高丽在经济上的诉求与他的政治目的不存在关联。忠烈王虽然曾经申诉远征带来的严重经济负担，却并没有反对出征，反而时常表现出支持的样子。特别是他指出第一次远征失败的原因是蒙古军与高丽军指挥部出现混乱，所以第二次远征时特别强调指挥统一的重要性。他还特别任命高丽的将领为万户职，赐予他们金牌，要求按照蒙古的官制赐予他们指挥权，以保证两军的统一。蒙古准许了忠烈王的要求，并任命高丽王也就是忠烈王为征东行省丞相。从此，高丽王开始兼任行省的丞相。

忠烈王在以下 3 个方面倍受关注。首先，利用蒙古对东征日本的强烈意愿来强化自己王权，为此，忠烈王还特别强调沿袭蒙古的风俗习惯以及制度。他作为驸马，强调自己是蒙古统治阶级一员，提供了蒙古认证他王权的名分。由第一点延伸出第二点，忠烈王向蒙古请求指挥权，并授予高丽的将领，形成高丽军与蒙古军的一元指挥体系。最重要的是，实际上忠烈王能够将蒙古军事制度里的“万户”，自行任命给高丽将领。第三点，蒙古不仅准许忠烈王对于指挥权的要求，更是任命忠烈王为行省丞相，认可高丽王的贡献。

我们可以说，在东征日本的准备过程中，忠烈王扩大自己王权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从忠烈王成为丞相这一点来看，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预期的目标。

简历

主要经历：

2012.05.-2014.02. 高丽大学 韩国史研究所 研究教授

2014.03.-2016.02. 高丽大学 BK21PLUS 韩国史事业团 研究教授

2017.03.-至今 嘉泉(가치온, Gachon)大学 Liberal Arts College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高丽的政治制度, 权力构成 等。

高丽成宗显宗时代太祖配享功臣的选定过程及意义(2014 探究高丽前期鱼袋的概念与运营方式(2015)

高丽蒙古关系的进展以及达鲁花赤的置废过程(2015)

高丽对蒙论理及“大国印象”——以 1231, 1232 年外交文书为中心——(2015)

高丽前期公服制的整顿过程研究(2016)

高丽内部达鲁花赤的存在状态及影响——通过达鲁花赤的蒙古统治方式经验——(2016)

对蒙战争及其讲和过程与高丽政权所处环境的变化

李命美 (Seoul 大学)

摘要

同蒙古的战争、交涉以及最终讲和的过程与高丽内部掌握政权的武臣政权垮台，恢复王权这一过程是连接起来的。此次演讲将讨论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高丽王权-政权有关的政治、外交方面的环境变化。

与高丽之前的外交对象国不同，蒙古作为游牧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建立关系方式从战争开始到讲和阶段都保持着比较强硬的态度。1230 年到 1240 年，与蒙古的战争以及交涉的过程中，高丽方面一直没有完整地回应过蒙古方面的要求，但是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回应。这种交涉的结果之一便是高丽宗室的外交政治活动。这种现象与蒙古的首将间直接的会面，重视个人及家族间关系的关系形成方式有关。高丽的王族体制中，包括太子在内，宗室的政治外交活动几乎不会在表面上显露出来，但借由蒙古战争这个契机，高丽宗室的活动开始表象化，而这种活动形式也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也给高丽-蒙古的关系以及高丽王权所处的环境带来了变化。

另一方面，高丽-蒙古之间“完全”讲和的过程与元宗由于武人政权的掌权者林衍而废位后又复位的过程是衔接起来的。这个过程也可以被看成是高丽与蒙古之间的关系导致的高丽王权所处环境变化。在当时的东亚国际秩序中，高丽国王需要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但是由于时效性较差，实际高丽国王的即位和退位（或者废免）都是依据高丽的内部情况决定的。但是蒙古接受了当时世子（也就是未来的忠烈王）的请婚和请军，还随军派遣了蒙古的诏使，高丽的王权也通过“实质性的册封”以及“与皇室的通婚”，与蒙古的皇权获得了直接的联系。这使得以往国家间的“册封”变成现实，同时通过通婚这个在蒙古维持政治关系时非常重要的媒介，形成家族之间的联系，给高丽-蒙古之间的关系带来变化。这种变化牵扯着两国，更是给高丽王权所处的环境带来转机。可以说这种变化是引发未来高丽与元朝关系中诸多政治事件的结构性的变化。

简历

首尔大学国史学系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硕士论文主题为《高丽与元朝王室通婚的开展与特征》，博士学位论文主题为《高丽-蒙古关系与高丽国王地位变化》（2016，《探究13~14世纪高丽-蒙古关系研究-征东行省丞相驸马高丽国王的多元地位》，惠安）。曾在首尔大学历史研究所，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等地工作，现就职于人文学研究院，担任研究员。研究国家之间的关系（东亚关系形成方式）以及个人·家族之间关系（蒙古关系形成方式）在高丽-蒙古关系中协调的模式，以及受其风波高丽末期的政治、社会的变动。

14 世纪时期蒙古帝国的饮食文化向高丽的传入与变化

赵阮（漢陽大学）

摘要

自 13 世纪蒙古帝国建国后，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此后各地域间文化交流持续。文化面的接触、刺激和变化，反映在蒙古帝国的物质文化领域中，尤其是饮食文化方面最为明显。13 世纪蒙古征服欧亚大陆后，各地向蒙古帝国进贡食物，用盛宴款待皇帝，因此 14 世纪帝国中心出现饮食文化的多样化和融合。饮食文化的变化逐渐从帝国中心传到周边地域。1260 年蒙古与高丽缔结友好关系以后，曾因佛教而被禁止的肉食文化也传入高丽。蒙古帝国的饮食文化传入高丽后，变得与高丽饮食习惯相吻合。肉类的处理方式和各种烹饪方法传入朝鲜半岛，但蒙古的羊肉被乳牛和猪肉所替代，而且元朝的部分饮酒文化也传到朝鲜半岛。

在朝鲜时代，随着佛教的衰退，作为茶的替代品饮料开始风行。在 14 世纪的《饮膳正要》介绍了清凉饮用水舍尔别的制作方法等相关知识，在 17~18 世纪朝鲜后期的日常生活书《山林经济》与农书《林园经济志》中被介绍成枯水。本文讨论蒙古帝国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及其传入高丽地区的过程，通过探寻蒙古饮食文化传入朝鲜半岛的踪迹，来判断 13 世纪在蒙古帝国扩张过程中出现的蒙古帝国作为世界级现象的特征及其意义。

演讲主题: 浅析北元与高丽关系-以禡王时期关系为中心

其林道尔吉 (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摘要

1368年至1388年间，元朝失守首都，退守北方，这段时期的元朝称为“北元”。北元时期是一个中原没有明显的统治者，很难判断时局的过渡时期。北元与高丽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恭愍王时期关系”和“禡王时期关系”。恭愍王时期，高丽在明与元进行角逐的时候，实行强化自主性的政策。1369年，恭愍王政权断绝与元朝的关系，与明朝建立事大关系。不仅如此，还讨伐元朝领土，显示出敌对态度。恭愍王这样的行为被认为十分突然，而且有些性急。但是与此同时，事实上恭愍王又并没有完全切断与北元之间的联系，一直维持着并行的关系。

1372年战争结束后，北元恢复国内外局势的安全，开始与高丽进行积极的外交活动。但是由于恭愍王坚持亲明政策，最终对高丽的怀柔政策以失败告终。

而禡王继任恭愍王之后，高丽与北元之间的关系又出现了变化。高丽不仅维护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还试图重建与曾经断交的北元之间的关系。但是遭到反对势力的阻挠，历经曲折，最终还是成果恢复建交。

高丽对北元重新建立的建立外交关系，是对恭愍王单方向外交政策的修正，也能够牵制明朝，符合北元与高丽的实质性需要，是维护当时东亚势力均衡的努力成果。

在本文中，我们将整体探讨禡王时期，北元与高丽关系的促进过程，以及这段关系对当时东亚的历史产生的影响和结果。

简历

1999年蒙古国立乌兰巴托大学毕业

2010年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博士毕业，获文学博士 (歷史學).

专业: 中世纪韩-蒙 关系史

主要作品:

1. Chinggish khan (encyclopedia), co-author, Ulaanbaatar, 2006
2. Encyclopedia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Mongols /co-author/, Ulaanbaatar, 2004, 2006
3.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元史/ (A Mongolian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by Ch. Dandaa), Volume I-XII, Foreword and textological study by Ts.Tserendorj, Ulaanbaatar, 2003
4. Saran-u gerel /Moonlight/. Biography of Zaya bandita of Oirat (Textological study, foreword and index by A.Ochir and Ts.Tserendorj), Ulaanbaatar, 2008
5. Iltgel shastir /欽定外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 Chapter 1-44, (Transliteration from Old Mongol into Modern Mongolian and comments by Tsegmed Tserendorj and others), Ulaanbaatar, 2007
6. Manchu Veritable Records /滿洲實錄/ (Transliteration from Old Mongol into Modern Mongolian and comments by Tsegmed Tserendorj), Ulaanbaatar, 2009
7. Ogeled-un noyad-un ug eki /Origin of Olet noblemen/, (Textological study, foreword and index by Ts.Tserendorj), Ulaanbaatar, 2010
8. Samguk yusa (三國遺事)" (translation from Korean into Mongolian with J.Gantulga), Ulaanbaatar, 2009
9. Yangban- The ruling class of Korean traditional society, Seoul, 2013
10. A study on a royal mausoleum of ancient nomads, Ulaanbaatar, 2013
11. Parhae-ko (渤海考), (translation from Korean into Mongolian), Ulaanbaatar, 2014
12. Khubilai Khan and his succesors, Ulaanbaatar, 2015
13. 东西文化交流与阿尔泰//亚洲学术研究丛书 7 /阿尔泰学系列 3 : 亦乐, 2016 (共著)

原著: 韓國語、译者 : 羅奇

有关忽必烈送达日本的命令文内容与形式的比较研究

朝克图（内蒙古大学）

摘要

在 13 世纪中叶忽必烈建立元朝后，1266 年即至元三年开始与日本往来。为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先后六次向日本派遣使节，发布数次令诏。这些令诏以汉文写就，其中一些文本流传了下来，我们能从一定程度了解其内容与形式。向其他国家发布令诏是蒙古帝国在扩大、发展为世界性大帝国过程中与其他国家、地域交往时采用的外交手段之一。这些令诏还强调蒙古支配世界的理由和对不服从其支配行为采取的制裁措施。蒙古帝国的令诏以多种语言书写，大量留存于世界各地，帮助理解蒙古帝国扩大的历史经过极为珍贵的一手史料。虽然有关于蒙古帝国时代令诏的先行研究，但是将蒙古帝国向日本发布的令诏和蒙古帝国向其他国家、地域发布的令诏的比较分析等研究却并不充分。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忽必烈向日本发布的令诏和蒙古帝国向其他国家、地域发布的令诏，分析在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远征日本所具有的意义。

个人经历

1963 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1980 年 9 月至 1984 年 7 月就读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学院

1984 年 7 月起在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学院担任助教

1985 年 3 月至 1987 年 1 月北京大学语言学院学习波斯语

1993 年 9 月至 1997 年 6 月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研究所女真语专业硕士就读

1997 年 6 月至 1998 年 3 月日本富山大学人文学部外国人研究院

1998 年 4 月至 2000 年 3 月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访问学者

2000 年 4 月至 2006 年 7 月就读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博士就读

2006 年 8 月开始就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2007 年升任副教授，2012 年聘为教授

主要研究成果：

《成吉思汗的法》（山川出版社，2010 年）

从 1990 年代起先后发表三十余篇有关蒙古帝国、元朝历史的学术论文

原著：日本語、译者：宋剛